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第二辑
主编：杨镰

内外蒙古 考察日记

马鹤天/著 范子烨/整理

Neiwaimenggu
Kaochariji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第二辑
主编：杨镰

内外蒙古 考察日记

马鹤天 / 著 范子烨 / 整理

Neiwaimenggu
Kaochariji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内外蒙古考察日记/马鹤天著;范子烨整理.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12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ISBN 978-7-5153-1271-2

I.①内… II.①马…②范… III.①游记-内蒙古-民国②游记-外蒙
古-民国 IV.①K928.926②K928.9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7860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11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675×975 1/16 18.25印张 2插页 205千字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34.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总 序

20世纪，是人类社会进展最快的世纪。20世纪的通行话语是“变革”。

就中国而言，自进入20世纪，1911年“辛亥革命”为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谱系画上了句号，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普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20世纪前50年间，袁世凯“称帝”、溥仪重返紫禁城，北伐、长征、抗日战争……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受到举世关注。此后，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的感受，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20世纪是中国进入现代时期的关键的、不容忽视的转型期，以20世纪前半期为例，1900年，“八国联军”践踏中华文明，举国在抗议中反思；1901年，原来拒绝改良的清廷宣布执行新政；1906年，预备立宪……以世界背景而言，“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成立联合国……1911年到1949年，仅仅历时30多年，中国结束了封建社会，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的巨大跨越。反思20世纪，政治取向曾被视为文明演进的门槛，“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红，就是黑，一度成为舆论导向，影响了大众思维。

无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伴随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华民族的民主、科学精神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是中国历史最具影响力的事件，

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中国现代时期的鲜明特点。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则为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过程，提供了真实生动的佐证。

20世纪的丰富出版物中，一定程度上因为政治意图与具体事件脱节，人文地理著作长期以来未能受到充分关注，然而文学、历史、政治、文化、语言、民族、宗教、地理学、边疆学、地缘政治……等学科，普遍受到了人文地理读物的影响，它们是解读20世纪民主、科学思维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通用“教材”。

人文地理纪实无异于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进行的“国情调研”，进入20世纪的里程碑。没有这部分内容，20世纪前期——现代时期，会因缺失了细节，受到误解，直接导致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认识不足。

就学科进展而言，现代文学研究是最早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位置的学科之一，《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则为现代文学家铺设了通向文学殿堂的台阶：论证了他们的代表性，以及他们引领时代风气的意义。

与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学史的漫长历程相比，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0多年短如一瞬间，终结封建王朝世系，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现代时期定位的标志。

“人文地理”，是以人的活动为关注对象。风光物态、环境变迁、文物古迹、地缘政治……作为文明进步的背景，构建了“人文地理”的学术负载与阅读空间。

关于这个新课题，第一步是搜集并选择作品，经过校订整理重新出版。民国年间，中国的出版业从传统的木刻、手抄，进入石印、铅

印出版流程，出版物远比目前认为的（已知的）宽泛，《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的编辑出版，为现代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参照，树立了传之久远的丰碑。否则，经过时间的淘汰，难免流散失传，甚至面目全非。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与旅游文学、乡土志书、散文笔记、家谱实录等读物的区别在于：

人文地理纪实穿越了历史发展脉络，记录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得失成败。比如边疆，从东北到西北，没有的人文地理纪实之中读不到的盲区。21世纪，开发西部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开发西部并非始于今天，进入了现代时期便成为学术精英肩负的使命：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前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使中西部与政治文化中心共同享有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共同面对美好前景。通过《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我们与开拓者一路同行，走进中西部，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分担他们的艰难困苦。感受文明、传承文明。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会因岁月流逝、天灾人祸，而零落泯灭。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是20世纪结束后，重返这一历史时期的高速路、立交桥。

“明驼足”与“长征志”

——马鹤天和他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

范子烨

“吃饭时，风依然狂暴，沙尘飞入碗内，食之有声。”“下午，风雪交加，入晚，风更烈。我们九人，屈促在驼夫的一个小帐房内。……风吼雪飘，益增凄凉，人人相对无言，嘘唏长叹，种种感想，涌现脑际，不禁想见苏武留胡的景况。饭后，大家急拥厚被，和衣挤卧，风声益厉，帐房将拔，人人惶恐。眠既不得，起又不能，这种太古生活，凄凉生活，可说是生平未有。但我个人反感觉特别兴味，坦然高卧。”1926年11月24日马鹤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类似的记述在《内外蒙古考察日记》（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初版，以下简称“《日记》”）中随处可见。的确，在我国现代的学者之林中，很少有像马鹤天那样不辞艰险、壮游天下的人物。但马氏之游不是庄子的逍遥游，也不是石崇的金谷游，更不是徐霞客的山水游，而是一种浸透了深沉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情怀的文化之旅，是对现实的执著——以服务于国家为宗旨，是对历史的回应——以效忠于民族为目的。于是，我们在马氏一人独著的《边疆丛书》中看到了这些著作：《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东北考察记》（新亚细亚学会，1934）、《西北考察记：青海篇》（正中书局，1936）和《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商务印书馆，1948）。此外，他的《边疆杂咏》（中国边疆学会陕西省分会，1945）和《蒙藏民族的历史概述》（抄本），皆属

同类著作。马氏还有另外两套一人独著的丛书：一为《抗日丛书》，包括《救国嘤鸣集》（新亚细亚学会版）、《旧恨新仇录》（东京神州学会版）、《列强在中国之竞争》（北平《国风日报》版）和《辟中日同盟说》（上海《救国日报》版）；一为《教育丛书》，包括《日本之教育》（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出版）、《江苏教育观察记》（同上）、《教授法》（同上）、《菲律宾教育考察日记》（山西学术研究会版）和《新广东教育考察日记》（北平民族大学版）。教育为国家之基础，民族为国家之基石，在中、日两国民族矛盾极为剧烈的年代，救国意识体现了一位真正学者的良知。“长城自昔限夷华，蒙汉如今是一家；兄弟同仇堪御侮，莫教倭骑渡平沙。”（马鹤天《伊盟杂咏·经长城有感》）诗言志。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就是他平生志业的理想追求。作为国民政府的高级文化官员和边疆史地专家，马鹤天一生为国家而奔走，为民族而呼唤，为人民而献身，因而他的壮游既负荷着国家与民族的重大使命，其诗性的况味和历史的意蕴，也令人涵咏不尽。就让我们以《日记》为核心，切入到马氏的漫漫征途与大漠草原，掘发这部名著的特殊的人文价值和历史价值。

傅斯年说：“惟有从事实上认识边疆，我们才能保有我们的边疆。”而认识边疆的前提是必须深入边疆，正所谓“非冒风雪、忍饥寒、身历其境者不得”（《日记·凡例》）。在《日记》问世之前，关于蒙古的知识，“大抵取材于日本人之记载，并未身历其境。当时之搜集蒙古出版物，日文者约数十种，中文者不过数种而已。且日人著作，多系实地调查之记载，故材料比较丰富而确实，中国从来去蒙古者，非官即商，商人无相当知识，不能调查记载；官员虽有知识，不肯调查记载，以故较详之出版物，可谓绝无。鹤天久思一游

其地，实地考察，但苦不得机会”（《日记·自序》）。民国十五年（1926）秋，机会终于来了，正如马氏自述：“民国十五年秋，因革命的必要，被派赴外蒙。九月二十三日，由兰州首途，十二月二十三日，始抵库伦^①，途中整经三月。留库月余，又经布里雅特^②蒙古，至莫斯科，后复返库伦。十六年五月，始由阿拉善回甘。往返九阅月，行地万余里，由秋而冬而春而夏，由兰州、凉州、甘州，而内蒙额济纳，而外蒙郭尔班赛恒旗、三音诺颜汉部、库伦，而布里雅特蒙古。归途经外蒙谢图汗部，内蒙阿拉善至宁夏，返兰州。西套蒙古全历，外蒙四部经过其二。内蒙之王公政治，外蒙之共和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种族、宗教、交通等等，无不略知概况。行的工具，始而骡车，继而骆驼，继而蒙古马，又继而布里雅特车，再继而汽车、火车。由畜牧生活之内内蒙，到苏维埃政治组织之布里雅特蒙古，真似读了一部人类进化史。”（《日记·自序》）在冰天雪地中，马鹤天逐日做笔记，整理成书后，由于右任亲自题写书名并作序，面世后，迅即风行全国。《日记》约计20万字，配有20多幅插图，按照游踪分为十部分：（一）由甘肃张掖至内蒙额济纳；（二）由内蒙额济纳至外蒙拜申图；（三）留郭尔班赛恒乌拉旗；（四）由郭尔班赛恒旗至三音诺颜汉部；（五）留三音诺颜汉部；（六）由三音诺颜汉部至库伦；（七）留居库伦；（八）由库伦至布里雅特蒙古；（九）由库伦至内蒙阿拉善；（十）由内蒙阿拉善至宁夏。附录有五言纪行诗《蒙古行》、《俄蒙协约》、《中俄申明文件》和《中俄蒙协约》四种。

“凡关于外蒙独立经过，政治、教育、财政、军事、党务、宗教、工

①库伦，即今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整理者注。

②布里雅特，今作布里亚特，位于俄罗斯境内。整理者注。

商业，以及属地面积、民族人口、山川地势、气候、物产、交通，并库伦汉商之痛苦，俄人、蒙人、日人之情形，无不备述……第八章为外蒙北部及布里雅特蒙古之情形。”（《日记·凡例》）所以，马氏的这部《日记》在民国时代享有“蒙古文化宝鉴”的美誉。

《日记》最重要的笔墨在于对外蒙古独立过程以及政治方面的记述。据马氏民国十五年（1926）十二月二十六日所记，清末派驻外蒙的官吏，如延福、三多之流，借举办新政之名勒索蒙人，激起强烈仇恨，而满清革拿达赖喇嘛命令到库伦时，哲布尊丹巴活佛已有谋逆之心，俄国利用这个机会，对清廷在蒙古练兵、移民等事横加干涉，一面结好蒙人，一面鼓动亲俄派多尔济亲王借会盟之名，密议独立。及武昌起义，俄人更大肆拨弄，且出兵援助，于是外蒙古的喀尔喀四部，于1911年11月30日宣布独立，驱逐中国官吏，建立蒙古帝国，改元“共戴”，以哲布尊丹巴为皇帝。此前，1911年11月3日，俄派公使廓索维慈赴库伦，订立密约，其要旨为扶助外蒙自治及训练蒙军，不准中国驻兵、移民，俄在外蒙获得政治、经济上各种特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俄又秘约攻守同盟，共同执掌蒙事。1917年，白俄谢米诺夫勾结蒙匪，欲在海拉尔设立蒙古政府，哲布尊丹巴自觉前途危险，乃决意取消自治，求援于中国政府。1919年10月，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兵四千到库伦，11月22日，取消自治，废止一切蒙俄协议。但徐氏只知用铁腕高压，大失蒙古王公之心。1920年10月，白俄巴龙恩琴受日本之接济，率残军侵犯库伦，于1921年2月占领库伦，3月21日宣布外蒙古二次独立，蒙人再次求援于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却置若罔闻，于是，苏联红军在1921年夏进军库伦，消灭恩琴残部，同年7月6日，在红军的监督

之下，组织国民政府，仍承认哲布尊丹巴为君主，但限制其权利，而各重要机关都有俄人顾问，掌握实权。1921年11月5日，在莫斯科缔结俄蒙密约，承认外蒙独立。至此，“实际上外蒙已完全非我有矣”，“表面外蒙独立，实际上一切不能独立”。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马鹤天的观察是准确的，他的上述观点也是有预见性的。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有关外蒙问题的决议，使得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都难以挽回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而苏联军队直到1992年才最后撤出外蒙。据民国十六年一月三日马氏所记，1924年5月，空有君主虚名的活佛逝世，外蒙国民政府宣言实行苏维埃式的共和政治，废止王位，同年11月召集大国民议会，改库伦旧名为乌兰巴图尔和特（即今乌兰巴托，意为赤色勇武之都）。当时，外蒙古的政党主要有国民党和青年党，其中青年党充当了苏联人的枪手。在1922年至1923年的恐怖时代，多数高级贵族、喇嘛，一律被判为反革命，而被肆意杀害，如总理和特、总司令巴图鲁、内务总长布克特尔以及司法总长特夫特等国民党元老。当时有一个使人闻之色变的肃反机构，名为隔别屋（内防处），曾一次枪杀了16名活佛的亲信喇嘛（《日记》民国十六年一月五日）。于是，蒙古的精英人物被消灭殆尽。显然，苏联人的治蒙之术是以蒙治蒙，即发展、培养外蒙古上层人士的对立面，然后出钱出枪予以支持。最后，马氏断言：“外蒙古的国际关系，可说是在矛盾暧昧之中，这完全由于苏俄外交家手段的巧妙，依然蹈袭帝俄时代‘弃名取实’的政策。”（《日记》民国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在他看来，俄国的外交家很善于“弹性外交”，而相比之下，当时中国的外交家们则极为缺乏政治上的远大目光和深沉理性，缺乏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把握历史的卓越能力。在这种情形之下，蒙人虽然有回归之

心，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当“十月革命”的“春风”吹遍外蒙古大草原的时候，草原上的政治空气格外浓郁，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热情似乎高于对羊肉和奶茶的兴趣。马氏写道：“本日渐党部蒙古包，复红旗高揭，知又开会。但细看旗上的文字，与前不同，知系青年党，凡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年入之。黄昏，闻革命歌声，知始散会。留旗四日，几无日不有会，每会半日或半夜，甚至上午直到夜晚，革命精神，已见一斑。”（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革命会议多而长，革命歌声响而亮，这确实是革命政党的两个突出特点。他还写道：“外蒙党政界，开新年庆祝宴会于中央党部，列席者，中央执行委员、国会议员及政府各机关要人，俄国倪大使、中国国民党代表陈继淹等，共百余人。由国会议长代表，对七年前革命有功的五人，颁给勋章，受者都有誓词，并由政府主席车林多尔基致辞，略谓蒙古共和成立，业已七年，种种方面，所以有现在的基础，都是诸位同志奋斗之力，以后希望中国和内蒙相继革命成功，完成东方革命，并希望苏联援助各弱小民族，促成世界革命云云。……一时革命空气，非常浓厚。”（民国十六年一月一日）最有趣的是中国国民党举行的“漠北盛会”：“晚，举行中山室开幕，及墙报发刊纪念会，请有俄蒙各同志。俄人德明君，蒙人包、霍二君参加。陈君令我主席，读遗嘱后，略述总理所谓‘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之深意，希望俄蒙同志，联合共同战线，打倒帝国主义云云。次俄、蒙各同志，均有演说，最后唱《国际歌》，可说是漠北的盛会。”（《日记》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七日）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唱《国际歌》，只有“老大哥”敢这样干，如果在中国国内有人这样做，那恐怕是要杀头的。这些会议都奇妙之极。与此

相关的是外蒙的“革命文艺”。《日记》详细记载了“外蒙古新剧”的有关内容和演出情况（民国十六年一月二十日）。该剧演出规格很高，台前有乐队伴奏，“奏者蒙女八九人，男子一二人，有胡琴、三弦、洋琴、笛等乐器，可说是汉蒙四合作。因胡琴原系蒙古乐器，三弦与笛，为中国乐器，洋琴又是西洋乐器，曲全汉调，因系由中国商人学得。”其实，三弦是满、蒙、汉三族共有的乐器，至于“洋琴”，则可能是指钢琴，为俄罗斯通行之乐器。这部新剧主要描写蒙古下层人民的苦难，蒙古王公的威权以及喇嘛的淫恶，“各幕内插有许多滑稽，如王公仆役的捉虱吃虱，懒卧顽戏，某公属员和喇嘛的酒醉，当场大便，怪状百出，颇堪发噱。”显然，编剧的水平实在有限，与《小二黑结婚》、《白毛女》之类的伟大作品不可同日而语。或许，没有马氏的记载，这种富于革命色彩的蒙古新剧就不会为我们所知了。

《日记》的可读性极强。每篇日记都有标题，如：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蒙古之医术 宣传革命的画报》，十一月二十五日《青年党开会竟曰 女生谈话自由小便自由》，十二月三日《愧不如蒙古女子 一碗四用——洗脸漱口喝茶吃饭》，十二月四日《牛羊同屋男女共枕 儿啼聒耳粪息扑鼻》，读者一见即被锁定眼球。不仅如此，马氏本为诗人，故《日记》之叙事时见诗笔，而写景如画，情景交融正是其突出的文学特征：“晚九时半，始到天水井，仅行六十里。除小庙一间外，一无所有。我和赵、吕两君等，架张军用帐篷，周围用土压之。随行的同人，拾驼粪做燃料，汲水煮饭。离小庙几十步有一井，深不及五尺，即所谓甜水井。尝其味，不但不甜，且稍咸而苦，并有烟味。时为阴历十四日，仰观俯视，月明在天，众星

灿烂，黄沙在地，丛草棋布，真是天地为庐月为灯，可谓第一夜的蒙古风味。”（民国十五年十月二十日）“西南有一小山，突立在沙漠平原中，好似小孤山，独立江中。因山麓四面皆平，而中坟起，可证明戈壁在古代实为大海。沙中风起，吹成螺形，亦大类水面波光。入夜月出，最初满天红光，继而一轮半露，大如车轮，大地渐放光明，沙漠中别有奇景，颇饶兴味。”（民国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沿河岸行，草多且茂，和沙漠中风景，大不相同，但和内地的草也大异。……未几，太阳衔山，天空现赤黄色，升上片云，成金黄色，俯视水中，呈黄绿色，山水云天，黄赤绿紫，灿烂光辉，异样美观，不意蒙古地方，见此美景。”（民国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日记》的文笔就是如此简洁优美，如此摇曳多姿，颇具晚明小品的风韵。

《日记》还有许多闲笔，虽波澜不惊，平平道来，却令人回味无穷，如马氏写道：“骆驼夜眠早放，马夜间放牧，马夫忽来说：昨夜马放牧脱逃，追十余里始赶回。又骆驼群，必有一犬，每夜防守。驼夫忽来说：我们的母犬，昨夜生了小犬四头，今天能否随行，尚不可知。言未了，忽有一大黑犬旁立，不知从何处飞来。我们便一面喂食，一面用绳拴住，预备遂驼前行。大家忙了半天，我笑对同人说：我们今日，可说是‘犬马之劳’。”（民国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原随的母犬，自产子后，每到宿处，即先哺乳他的儿犬，原产四子，驼夫弃了三个，仅余一个，行时装在衣袖内，抱置驼上，有时坠地，母犬即用口衔之随行，路上亦喂乳数次。犬的母子之情，可说是与人无异。又骆驼雍容大度，行路时一步一步，始终如一，止宿静卧徐喘，可说是君子风。”（民国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昨晚驼儿死去，竟哭号一夜，哀鸣之声，不忍入耳。清晨大家围观，见母驼依

然悲号，两行眼泪，点点滴滴，驼之爱儿情切，可说是与人无异。”

（民国十六年二月三十日）骆驼和狗是忠诚、勤劳和理解的象征，它们喜欢羁縻于人类的驱使与关爱之下的自由，它们的存在标志着人类的存在，它们的消失既是人类衰败的证明，也将预示着人类最后厄运的降临，它们是普通而伟大的动物。马氏这些轻松的记述极大地缓冲了塞外的自然风雪和政治烟云给读者造成的压力，为《日记》注入了一缕清新的自然趣味。

《日记》并非尽善尽美之书。蒙古文化之核心首先在于宗教信仰（包括藏传佛教和草原萨满教），其次在于音乐歌舞，马氏于前者既多误解，常常将宗教和迷信画等号，而于后者更是不甚了了，着墨极少，所以这本书与丹麦学者亨宁·哈士伦的名著《蒙古的人和神》是迥异其趣的。譬如，他见到青少年喇嘛诵经，不禁感叹道：“十一二岁的小儿，也当小喇嘛，把青年有用光阴，消磨于跪拜念经之中，见之可怜。”“每日念经，上午两次，清早一次，十一时一次，念时打大鼓，摇小鼓，吹喇叭，打铜钹，并摇铃，以孔雀羽洒水。种种动作，见之可笑。”（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四日）“青年光阴，如此消磨，真是可惜！”（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自古以来，汉地僧侣幼年出家者比比皆是，而黄教音乐的雄浑优美、深沉肃穆，又“可笑”在哪里？又如马氏见到一位行脚僧人，这样写道：“冰天雪地，不觉寒苦，不诵于庙而诵于道，可笑亦殊可怜！”（民国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倘若如此，那位伟大的迦毗罗卫国的王子行乞人间似乎就是人类的奇耻大辱了。再如，在马氏牐列的种种“外蒙的社会恶习”中有一种是“嗜酒”，他说：“蒙人嗜酒，为原来天性，较汉人、俄人均甚。无论男妇贵贱，往往酩酊大醉，颠行市上。听说中国商人，

在蒙古各地营商时，往往利用此点，蒙人来时，先用不要钱的酒，供他尽喝，等到半醉时，再和他议价登账。蒙人很有信用，一经口认，绝不翻改，因此每吃大亏。”（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汉商的狡诈欺骗恰好表明了蒙古人性格的淳厚和真诚。类似的事情如2010年7月10日上午，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我曾经到一个蒙古包内为一位年龄较大的汉族学者借棉衣，包内的一个牧民说：“棉衣，有的，你吃早饭了吗？先喝一碗奶茶吧！”按照马氏的逻辑，“轻易地把自己的东西借给别人”和“请人吃饭”也当属于蒙古人的“恶习”？对于丰美的草原，马氏动辄说此处应该开垦农田，那里应该种上庄稼，其实蒙古人对于草原的爱护和尊重，那种情感是极为强烈极有诗意的，也是符合今日保护草原生态的科学思想的，而对于这种情感，马氏确有难以克服的胡越之隔。尤其不能原谅的是他关于民族史的错误叙述：“蒙古民族，强悍勇敢，如周之猛烈獯豸、山戎，秦汉之匈奴、乌桓、鲜卑，隋唐之奚契丹，皆蒙古的一部，世为中国边患。”（民国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倘若这些民族都是“蒙古的一部”，我们的民族史真该重写了！但马氏是政府官员，他最敏感、最具洞察力的是政治领域，《日记》触及了那一时代的令国人惊心动魄的、也令国人永远痛苦的大问题，谨此一点就足以使马氏炳烜千秋了。因此，我们不应对他求全责备，而应持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马鹤天（1887-？）是山西芮城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教育科科长、北平民国大学总务长、兰州中山大学校长、甘肃学院院长、甘肃省政府委员、甘肃教育厅厅长、国民政府铨叙部育才司司长和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创办《西北半

月刊》、《新亚细亚月刊》、《甘肃白话日报》和《西北》等报刊，创办甘肃教育馆、甘肃大学及幼稚园。除了上文提及的著作，他还著有《山东河南印影录》（北平公记印书局，1924）、《青海考察记》（1927）和《新秩序的原形态》（1939），与戴季陶等人合著《西北：西北之实况与其开发》（新亚细亚学会，1931），并发表了大量与西北史地有关的文章。1923年，他发起并创建了中华西北协会，后与顾颉刚、黄奋生、韩儒林和赵守珩等人创建了中国边疆学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马鹤天奉命出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大员，并被任命为九世班禅大师回藏专使行署参赞。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中，马氏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时人对他的工作业绩给予极高的评价，如黄奋生说：“马鹤天先生，以致力边疆事业，为其平生抱负，一般人热腾腾地在内地通都大邑翻筋斗兜圈子的时候，而他发愤急起，不避艰险，先到西北，继到蒙古，又赴东北，更去康藏，伟大的中国边疆，几乎都留下他的足迹。《内外蒙古考察日记》的问世，风行全国，提示了国人对于朔方不少认识。”汪公亮说：“鹤天先生从政羌陇，北历俄、蒙，所著《内外蒙古考察日记》、《青海考察记》，皆从九死一生中写出，为西北地理之原料。”戴季陶说：“马鹤天先生久历蒙疆，对于蒙古既富于知识，复富于同情，近日于从政之暇，将其考察内外蒙古日记整理刊行，俾内地人士了然于蒙古实况，其为益于国家民族之前途者，深望蒙汉同胞共明斯旨，一德一心造成形神俱一之中国民族者，为永久和平统一之保证也。”马氏的卓越成就与时代风气和文化思潮密切相关。1916年，吴文藻指出，“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倘其文明生活之